

绪 论

0.1 新形势下的危机与挑战

1998 年 3 月 17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众望所归，高票当选，全场掌声雷鸣。然而，以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受命于亚洲金融风暴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正处转型之时，上台伊始就面对着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严峻挑战。

亚洲金融危机自 1997 年 7 月初爆发至今，已使中国经济露出了疲态：资金匮乏的亚洲企业已无法继续投资中国，从而使外资流入中国的进程趋缓；外销厂商的订单已转向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更便宜的厂商；沿海地区房地产热陷入谷底；失业率上升；国营事业坏帐继续攀高。整体经济的健康备受威胁。虽然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也没有其他亚洲风暴国面临的短债过高问题，但现有的问题已让人再次质疑，中国是否能成功抵挡未来可能的风暴？

中国目前正进入经济体制转型期，为安置下岗职工的去路及产品结构的调整，内地城镇失业人数可能达到 1,550 多万人，城镇真实失业率 7.5% 左右，农村真实失业率则可能高达 34.8%。出现高失业率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与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矛盾；另一方面，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增长，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又加快了排斥劳动力的速度。

面对着上述严峻的经济形势，以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已清楚地意识到，适应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国内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转型，中国已到了必须求新变革的时候。新的“施政纲领”正是适

应上述这一形势而出炉的。朱镕基在 1998 年 3 月 19 日举行的上任总理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上，就政府的“施政纲领”作了全面的阐述，其要点包括“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 是当前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挑战，新政府必须确保经济发展速度达到 8%，通货膨胀率小于 3% 且人民币不能贬值。用朱镕基的原话：“这一点必须要做到，因为它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亚洲的稳定。”

三个到位 确定在三年的时间里，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 使大多数大中型亏损国企摆脱困境，进而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2) 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使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管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

(3) 改革政府机构，政府机关人数分流一半。

五项改革

(1)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因为连续三年丰收，粮食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库存庞大，政府财政的补贴也相应增加，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销售体制的改革。

(2) 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因为现行的投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的制度，不能贯彻把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力量，产生了很多重复建设。

(3) 住房制度改革。改变现行福利分配房屋的政策，把住房改为货币化、商品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

(4) 医疗制度改革。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的福利。

(5) 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因为目前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各级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必须整顿和改革。

然而，“施政纲领”是否能在既定的时期中获得成功，特别是

能否确保 8% 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检视外围和全球经济的形势：亚洲金融风暴是否还会恶化？如果不会恶化，那么亚洲在经历这一次伤筋动骨的金融危机后，将需要多少时间来复兴经济？印尼的政经局势会否导致另一次的骨牌危机？日本经济是否会因为 10 万亿日元的经济振兴预算案而复兴？美国在 8 年经济荣景后是否可能出现一次较大的周期性调整？等等。所有这一切外部经济因素都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新“施政纲领”实施的成败与否。就是“施政纲领”本身也暴露出一些需要探讨的弱点，这实质上是“施政纲领”能否贯彻落实、行之有效的问题：

(1) “施政纲领”将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 8%，通货膨胀率 3%。在市场经济比重日重的条件下作如此斩钉截铁式的限定，带着较为浓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由于受亚洲风暴的影响，中国相对出口竞争优势渐失。更重要的是，外资都以为人民币迟早要贬值，对中国的投资心存观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流入中国的数额必然大幅减少。虽然中国将大兴土木，如兴建住宅（新的经济增长点）及在基建上投入巨资，但这类投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得以进行。换句话说，1998 年投入市场的资金不可能太多。伦敦独立策略顾问公司主席罗奇（前摩根·史丹利首席策略员）在 1998 年 3 月 9 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由于中国 50% 出口在亚洲区，区内各国货币萎缩，购买中国货的“胃口”自然大为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论者对新总理许下的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幅度 8% 的“诺言”疑虑甚大。应该提醒中国政府的是，几乎所有不公开的有关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比如各投资银行）都表示对中国发布的数据不能尽信。新兴市场集团主席甚至表示，中国统计数字与事实差距达 GDP 三个百分点。为了达到 8% 的硬性指示，朱镕基总理可能为吸引外资树威立信；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可能虚报，而使统计数字失实。

(2) 如果像上述那样大规模刺激经济，将使中国再次面临着

放弃财政紧缩政策、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性。1992 年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开发高潮，从而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加剧的局面。1994 年，中央鉴于高速经济增长、高度通货膨胀，开始了经济降温行动，于是房产投资、股票投资、商业投资一下子又退了潮。1997 年，中国宣布已成功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的重大胜利——经济宏观调控的“软着陆”。殊不知，这种“膨胀—收缩一再膨胀”模式自 1949 年以后一再被运用，虽然运用它是不自愿的，但每一个周期的周而复始都造成了中国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大量固定资产闲置，资源被无尽地浪费，劳动力被遣散，不适用的商品堆积如山，商厦空置率高，如此等等。希望新“施政纲领”所强调的新一轮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是在已充分领悟到以往反反复复的经济教训下进行的；是在规范投资行为，令行禁止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也是在充分反映市场机制，并在政府有条不紊指导下进行的。新一轮的投资开发潮，希望不再重复出现 1993 年起在中国出现的经济乱象，而是实实在在地推行中国经济增长的运动。

(3) 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国际大资本打败地区和国家小资本的商战，使中国培植大企业的议题更迫切地浮上台面。近年来，中国政府以韩国大企业模式为参照系，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要力争抓出几个特大企业，挤进全球 500 强。中共十五大更进一步决定，要组建特大型企业集团，鼓励兼并重组。显然，这一“抓大放小”的战略明显蕴含着拔苗助长的极大风险。

韩国“大企业模式”至少有六大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1) 贪大图快，(2) 误把规模经济等同经济规模，(3) 过分追求多元化经营，(4) 过分强调低成本扩张，(5) 误把资本经营看成是生产经营，(6) 企业自身建设滞后。韩国 1997 年受到风暴影响，全国五十大型企业集团中已有九家相继倒闭，这正说明大企业存在

着诸多弊端。中国计委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中国应警惕韩国“大企业模式”的内在风险，希望中国当局“不要舐舩舩接航空母舰”，防止国营企业无限度地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对此，笔者也有同感。

必须明白，世界上真正强壮的大企业都是经过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滚爬练打，循着市场经济的物竞天择、留强汰弱的轨道前行而形成的。它们当年也是小企业，之所以能生存和壮大一定有其合理性，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企业的自身增长和兼并他人的能力，实质上说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商战中血与火洗礼的结果！新政府如果把理应是市场的份额喂养一些凭着长官意志选择出来的企业，再以捆绑方式替它们搞合并，让它们从呱呱落地就养尊处优、不知天高地厚，然后三几年把它们加以包装出品，推到世界市场的风口浪尖中公开与人对垒，其处境可想而知！这种垄断官僚式的大企业其实并没有走出当年计划经济模式的窠臼。藉韩国财团危机的教训，应提请中国政府重新思考大企业发展的产业模式。

（4）这次人大的一项最重大改革是削减部委，实现政企分开。中国新领导在时滞了近五十年后终于向其庞大多病的官僚机构开刀，显示了他们改革的魄力、决心和力度。然而，这是一次没有麻醉的“手术”，必须要经过一番焦虑、痛苦、呐喊和挣扎。未来几年内，如果“手术”能顺利进行的话，中国政府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目标也许可以实现。但我们毕竟要问：政府是否已为应付机构改革可能引发的种种突发事态而做好了准备？一个不容逃避的现实问题是，这次规模空前的机构改革正好与国企和军队的裁员时间吻合，它所导致的就业问题可能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央政府要下来两万人，整个国家机构要下来 50 万至 100 万人，如果将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在今后

三年内裁减一半，那就意味着每年有 500 万干部要被“分流”。而目前所知的其他有关数字是，每年有约 1,500 万适龄青年劳动力进入劳工市场；至 2000 年，解放军将裁员 50 万、纺织业 60 万、钢铁业 70 万、铁道部 100 万。一般国企大幅裁员也势所必然。黑龙江一位副省长指出，该省的林、矿业若要转亏为盈，必须辞退六成工人。

同工人和军人相比，机关干部具有较高的学历、较多的工作经验，有更大的号召力、更强的组织能力，如果这些人不能妥善安置，将有潜在危险。实际上，按照目前的改革政策来看，政府重新安置这些人的余地又十分有限。在完全缺乏“社会安全网”（朱镕基总理仅提出改善医疗制度而没有把这一医疗制度及其他保险与裁减联系起来）及国家绝不会再长期提供补贴的情形下，中国“下岗”问题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力。如果上述的经济发展不能加快的话，问题恐怕不是光一个“施政纲领”所能轻易解决的。最可行的办法是加快 1998 年和 1999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为机关下岗人员创造施展才能的机会。

（5）不管中国新领导对银行体系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案，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填补各银行因国企大量呆坏帐所形成的资金短绌现象。据估计，单是填这个黑洞所需的资金将是好几千亿元人民币。除非中国银行能够站在信用分析基础上进行放款，否则再多注资亦将形同扔入无底洞。中国至今缺乏全面注销银行坏帐的计划，缺乏法律架构使银行无法没收企业资产再卖给投资者，也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使关闭银行非常困难。中国甚至连监督国营银行资产的制度也阙如。这些问题近年已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讨论，但从讨论到最后实施，恐怕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这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新形势下的危机和挑战。朱镕基总理在中国经济困难重重及邻国经济与金融环境极为恶劣的时候，接

下了领导新内阁的重担，当然有能力、有决心、有拼劲，但新“施政纲领”定下的目标太大，完成的时间太短，成功的机会之中因而隐含着有可能失败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新政府面临着困局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中国现代化是其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重大、深远和必然发生的过程。这一变革一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历史机遇，蕴含着惊人的成功希望；另一方面，它又是交织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之中。由于发动工业化时间晚、条件差，加上 1949 年建国以来多次重大战略决策失误以及僵化体制下的低效益，中国经济起飞实质上是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发动的。未来二三十年内外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诸因素间矛盾相碰撞最为尖锐的时期。庞大的、持续增长的、质量低下的人口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众多不合理人口活动，超越了大自然所能支持的临界平衡极限，成为未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大压力。在经济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市场体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还将遭受各种新兴利益集团和利益主体的阻挠。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在科技进步推动下的全球化力量的扩展等因素，决定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将长期存在。从长远经济利益看，中国有被迫卷入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周边国家地区的冲突威胁，以及由国际势力推波助澜的国内分裂势力活动所带来的隐患，都从国际外部环境角度为中国经济起飞设制了潜在障碍。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拓展，中国将面临各种贸易摩擦和经济对抗，困难与风险成本都将相应增加。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多来自同等水平国家的剧烈竞争。全球金融资本一体化趋势，也将可能把全球或地区的金融危机带给正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危机面前，中国已不能像这次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那样置身度外了。

所有这些，正是笔者要在本书以下一系列的章节中详细研究

和分析的内容。

0.2 历史的机遇

永远的繁荣与昌盛有悖历史规律。历史上，有多少灿烂的文明各领过风骚，然后又都随风而去。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 W. F. Hegel）根据他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看法，提出了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人类文明同太阳一样：“精神的光明”首先从东方、亚细亚升起，东方文明（中国、印度、波斯）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之后，文明的箭头就随着日行线路，从东方中国，经过印度、中亚转移到古希腊、古罗马，到达西欧，最后在日耳曼世界达到辉煌的顶点。但是，黑格尔的预言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位德国人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轰动世界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毫不客气地宣称：“西方文明正在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1]

19 世纪下半叶，世界文明重心由大西洋西欧再次西移，进入北美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中心、“美元帝国”——美国为代表的“美洲世纪”。“美国文明”成了经久不衰的西方文明的代名词，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侵蚀。但是，盛年难再，如今的美国也开始在走下坡路。正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Naisbitt John）1983 年所写的：“问题的关键是，近年来的衰弱确是事实。”^[2]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文明重心再次西移，由北美洲大西洋进入亚洲太平洋。首先是日本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兴起，牵动了世界文明中心的东移；随后是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再次促使了世界中心东移；统计资料显示，80 年代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8%；1971—1990 年，世界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4%，而东亚为 6.8%，比前者高一倍；进入 90 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 7% 左右的高水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 1990 年以来，已连续四年处于低增长局面

(1993年平均仅增长 1.1%)。专家们预测,到 2000 年,东亚九国的增长速度可望达到 7.7%,其中,中国的增长速度最高,预计为 9.1%。^{【3】}

自 8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使它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农场、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心。高速增长的经济往往具有更多投资机会、更大市场潜力和丰厚投资收益。经济增长迅速的亚洲地区已经吸收了大量国际资本,成为全球投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1986—1991 年,投入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778 亿美元,较前五年的 222 亿美元增加了三倍多。^{【4】}巨额投资汇集于西太平洋黄金海岸。给亚太地区带来了高速发展与繁荣,形成了热火朝天的投资、大开发景观。

1997 年 7 月 2 日,亚洲爆发了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区域金融风暴。它率先起自泰国,然后迅速从东南亚各国蔓延至东亚,并波及全球,历时达 8 个月之久。期间,“亚洲奇迹”备受争议和考验。“亚洲奇迹”是否从此终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东移”之路是否从此阻断?亚洲是否还将复兴?笔者对前两者的回答是:“NO”,对后者的回答则是“YES”。美国史蒂文·拉德勒特(Steven Radelet)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两位学者从宏观角度回顾了亚洲经济 30 年来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描绘了这期间亚洲经济“奇迹”的历史图景及说明其基本原因,分析了亚洲经济将继续崛起,重新成为全世界经济活动中心的前景。他们断言,1997 年东南亚货币危机不是亚洲经济增长的结束,而是随同经济迅速增长而一再出现的金融局面不稳定模式。正如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迅速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这些亚洲经济体也将在两三年内恢复迅速增长。从长远看,增长将会继续下去,因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已经采纳了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生活的组织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跟全球经济一体化了。对日本来说,这种情形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自

1868 年明治维新时期以来便是如此。

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经济发展道路上一个必然发生的结构性变动事件；在作出结构调整后，亚洲经济将重上高速增长的路轨。因此，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进程中造成的制约只能是短暂的和有限的。

环太平洋时代的崛起是中国社会发展千载一遇的机遇。太平洋时代的降临也为中国提供了全球贸易的“天时”，环太平洋经济圈和“亚太世纪”的“地利”，以及“和平胜于战争”的“人和”。在大西洋经济时代，中国远处在边缘地带，现在却成了中兴“太平洋时代”的中枢和“中央王国”，位于亚洲太平洋中心。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当代国际局势发生的最深刻变化，莫过于 90 年代初二次大战后确立的雅尔塔格局的彻底崩溃，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正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状况不但不是 1949 年以来不曾有过的，也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好时期。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已让位于经济竞争，这一特点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从战略角度看，苏联解体也同时解除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这为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政治，其他国家对中国政治需要不断增加。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力量不平衡正不断向中国倾斜。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地位的不断冒升，美、日、俄、德四大力量对中国政治需求逐渐恢复和增加。美、俄减少和停滞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和军援，使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主动与中国发展联系，为的是寻求中国物质支持和学习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经验。多元化格局的集团松散化，使原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成员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利用联盟力量来对付中国。崛起的东亚正在成为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中心。中国在这一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地位不容置疑。世界主要大国都把与东亚国家发展合作联系作为其

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也就自然成为它们的合作对象。这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形势机遇。

当前，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五种主要力量——美、日、中、俄和东盟——的战略组合正在产生，并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微妙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俄、美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美三角关系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好转，这不仅解除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面临外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机遇。一些原先依靠苏联反华的邻国也在调整对华政策，使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安全环境有所改善。

(2) 东盟对中、美、日、俄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以防止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导地位有可能丧失的危险。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也有利于中国周边国家环境的稳定。

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发达国家正把传统工业技术成熟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西方国家的企业也正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方向之一是进一步发展跨国经营。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达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将在较长时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13亿人口的巨大潜在消费市场会迅速扩大。中国因此被看作是它们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对象。由于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外资的数量、规模和技术层次都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势态。而在世界军事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机会。除了加快投资速度之外，发达国家还放松了技术出口限制标准，希望藉高技术产品换取对华市场。最后，东亚区域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中国扩大出口和实现出口结构多元化创造了有利证

件。这既扩大了中国出口总量，又降低了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单一依附程度。

0.3 21 世纪中国的前途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富裕、文明、民主的新生活。在共和国近五十年历史上，对未来发展曾经有过多次设想。有的设想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且还在实践之中。如 1954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然而，有的设想却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浮躁情绪，如 1975 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 1975 年的形势看，在本世纪内实现上述目标似不太可能。更由于“左”的思潮，出现过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设想，如 1958 年“大跃进”时提出的在 1980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事实证明，这些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设想，使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为了使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怪圈，走向繁荣，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伟大胆略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以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于 1979 年首次提出了中国从本世纪 80 年代到下世纪中叶，用 70 年时间完成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最低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 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他在接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解释说：“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达到 800

美元。”小康目标要实现，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从1980年到1990年GNP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2000年，GNP再翻一番，建立小康社会；“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GNP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构思越来越具体。1984年10月，他把“三步走”目标加以量化，指出到本世纪末，人均GNP可以达到800美元多一点。“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达到一万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一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5】}

事实证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其中，“八五”计划时期（1990—1995年）更是1949年以来增长速度最高而又没有大起大落的时期。各年经济增长率是：1991年8%，1992年13.6%，1993年13.4%，1994年11.8%，1995年10%。^{【6】}从GDP看，“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7.9%，“八五”时期11.7%，高出“七五”时期整整四个百分点。尽管“八五”时期的快速增长也同时引发了一些经济过热问题，但在当局断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后，增长速度已降落到正常水平。“八五”期间，中国社会固定资产达到38,900亿元（人民币），而“七五”期间是19,744亿元，增长了整整5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基础设施建议投资，包括京九铁路、三峡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都是在“八五”期间开始建设的。中国GDP原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之后居第八位，经过“八五”时期已超过西班牙前移至第七位；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已由8.5%上升到11.9%，相当于日本的比例已从14.6%上升到20.9%。^{【7】}1995年“八五计划”的结束，成了邓小平“翻两番战略目标”提前五年实现的见证。

从1995年开始到201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为此，1996年年初，中共中央推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1996—2000年）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九五”计划中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

（1）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中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三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GNP比1980年翻两番（按照1980年比价），达到1,300美元，比80年代初期预言的800美元为高；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顺经济关系，推动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

（2）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避免出现中高度通货膨胀（10%以下）的基础上，每年经济增长要达到8—9%；同时，加强结构调整，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合理有效利用，初步实现从速度型、粗放型经济向效益型、集约型经济的转变。

（3）加强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中的四大支柱产业。到2000年，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调整为18.2%、52%、29.8%；工业的比例为84:16；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为1:1左右。

（4）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未来五年内，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5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增长38%；其中，55%将用于新建项目，其余用于“八五”延伸项目。

（5）国家将增加对中西部的支持。通过在财政、项目、政策、融资方面向中西部倾斜，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中西部以优势资源开发为突破口，通过与东部联合，建立有优势、有特色的区域经济。

（6）农业每年增长约为4%左右。至2000年的生产总目标是：粮食达到5亿吨，棉花增至525万吨，肉类为4,850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按照1990年不变价）达到1,200元人民币。

（7）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基础上，重点

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国有企业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领域转移，使大中型国有企业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实力和能力的大集团。

(8) 加强对外经济开放。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2000 年将达到 4,000 亿美元左右；同时，加大利用外贸和外国科技资源力度。为此，将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人民币逐步达到自由兑换，实现全方位开放。经过今后“九五”五年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将趋于现代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将保持较强增长势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可达到 6—9%，居民消费继续增加。据预测，35%以上的高储蓄率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保持 11% 的年均实质增长率；通货膨胀可能降低到一个新的水平，年均上涨率为 8—9%。

实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将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样姿态进入 21 世纪，决定着中国在新世纪世界政经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民族前途和命运。建议指出，今后十五年是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中国将在这一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建议认为，在未来十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将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其中主要是：

(1) 农业基础薄弱，不适应人口增长、生活提高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要日益增长的问题；

(2)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

(3) 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能力不强的问题；

(4) 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问题；

(5) 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就业压力大、生态环境日差的问题；

(6) 在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

(7) 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因腐败现象滋长、民主法制不完善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国务院和国家计委委托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为首的批经济学者，最近完成了《1995—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研究报告，从经济综合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等十个方面，对未来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预测；得出的结论是，1996至2000年（“九五”计划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9%，2000—2010年是7—8%，2010—2020年是6—7%，二十五年平均增速为7—8%。^{〔8〕}中国官方对今后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似乎证实了上述的计量预测。1996年1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巴基斯坦参议院发表演讲时说，根据中国发展规划，今后十五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9〕}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呈递减趋势，但还是处在世界高位上，从而保证其经济总量能够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同时指出，今后十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至少不会低于7.5%，到2010年，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规模将位居世界第三位，并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内“国际大循环”理论的作者、现中国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建认为，按照目前改革进程，再经过“九五”计划时期的补充和完善，中国到本世纪末会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经济体制雏形出现。国际资本由于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处于饱和状态转而投向正高速经济扩张的中国。中国经济发展将再次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大约会给中国带来长达二十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GNP 年增长将长期维持在 10% 上下。由此推算，到 2010 年时，中国 GNP 规模将达到 38,350 亿美元。届时中国 14 亿人口，人均产值为 2,740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人均产值达到 2,500 美元，是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此时，居民的物质消费可基本满足，需要转向劳务，由此推动服务产业发展，即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而农村人口工业化进程更将持续到 2020 年。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更乐观地预计，中国高速增长长期将持续 40 年或更长。他们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和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模型所计算的结果，预测中国在 1990—2050 年 GDP 年平均增长率（参见下表）。按照表中增长速度，中国 2020 年 GDP 将等于 1990 年的 10 倍，2030 年的 GDP 将等于 1990 年的 19 倍。美国 1990 年 GNP 为 54,475 亿美元，1970—1980 年美国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2.8%，1980—1991 年为 2.6%；预计今后三十年内其年平均增长率将为 2.5—3%。^{〔10〕}日本由于位于东亚地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对日本将有促进作用。日本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 34% 和 32%）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2% 和 21%），故日本的长期年平均增长率可达 3—4%，虽然目前日本经济还没有复苏。预计德国今后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2.5—3%，俄罗斯由于基础小，人均 GNP 较低，其增长速度将较快，今后的长期年平均增长率为 3—5%。按照下表所列的经济增长速度，2000 年中国的 GNP 约等于 1990 年的 243%，按基准年汇率计算法^{〔11〕}计算，中国 1990 年的 GNP 为 1.0288 万亿美元（1990 年美元，下同）；2000 年 GNP 约为 2.5 万亿元，2010 年约为 5.4 万亿美元，2020 年约为 10.6 万亿美元，2030 年约为 19.6 万亿美元，2050 年约为 52 万亿美元。预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日本、德国、